



Universiteit
Leiden
The Netherlands

Historians' virtues and vice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Herman Paul Kuang, M.; Paul, H.J.

Citation

Kuang, M., & Paul, H. J. (2024). Historians' virtues and vice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Herman Paul. *Shixue Yuekan [Journal Of Historical Science]*, (11), 120-131. Retriev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887/4170190>

Version: Publisher's Version

License: [Leiden University Non-exclusive license](#)

Downloaded from: <https://hdl.handle.net/1887/4170190>

Note: To cite this publication please use the final published version (if applicable).

· 海外学者访谈 ·

历史学家的美德与恶习

——赫尔曼·保罗教授访谈录

况明祺 赫尔曼·保罗

【摘要】荷兰史学理论及史学史家赫尔曼·保罗教授应邀参加访谈,分享了他的个人治学经验。师承当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安克斯密特的保罗教授将“美德语言”引入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领域,提出了“学者角色”的概念,引发了学者们的关注。此次访谈探寻了保罗教授个人的治学经历,他提出的“史学史与历史哲学”宣言的具体内涵,他正在进行的美德和恶习话语历史的研究项目,他对当代史学理论发展趋势的洞见以及他给中国学者从事西方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的些许建议。这一番对话呈现了保罗教授的学术研究及其观点,洞察了当代西方史学理论研究的前沿动态。

【关键词】 赫尔曼·保罗;学者角色;美德与恶习;职业与身份

【中图分类号】 K09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24)11-0120-12

受访人赫尔曼·保罗(Herman Paul, 1978—)是荷兰莱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他2006年于荷兰格罗宁根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师从当代著名史学理论家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 Ankersmit, 1945—),自2019年起担任莱顿大学人文学史讲席教授。保罗的研究范围涉及史学理论、史学史、人文学史、知识史等领域,其成果主要集中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方面。他在《历史与理论》《历史哲学》《重思历史》上已发表多篇文章。他提出将“美德语言(virtue language)”和“学者角色(scholarly persona)”引入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研究当中^①。保罗最近出版的著作是《历史学家的美德》(Herman Paul, *Historians' Virtu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3)一书,该书不仅从史学史的角度讨论了西方史学传统对史家美德的致意,同时兼具全球史的视野,将不同国家和地区的史学传统纳入考察之中。保罗此前出版的著作有《海登·怀特:历史的想象》[Hyden White: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 (Polity Press, 2011)]和《史学理论中的关键问题》[*Key Issues in Historical Theory* (Routledge, 2015)]两书。前者源于保罗的博士论文,专门论述了海登·怀特的史学理论,指出其中的存在主义思想。后者则是一部具有导论性质的著作,主要从“关系”的角度论述了史学理论的研究主题和范围。此外,保罗还负责编辑了《书写人文学史:问题、主题、方法》[*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ities: Questions, Themes, and Approaches* (Bloomsbury Academic, 2023)]和《如何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历史研究中的学者角色,1800—2000》[*How to be a Historian: Scholarly Personae in Historical Studies, 1800—2000*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9)]两书。从2019年开始,保罗获得荷兰研究理事会的重大项目资助,开始主持一项名为“学者恶习:一个长时段的历史(Scholarly Vices: A Longue Durée History)”的项目,该研究旨在探究不同学科学者在18到20世纪之间使用美德和恶习话语的历史。

^① 国内学界对赫尔曼·保罗的“美德语言”和“学者角色”概念已有初步论说。参见况明祺:《德性语言与学者角色:西方史学理论的新议程》,杨共乐主编,《史学理论与史学史学刊》2019年下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第235~250页;顾晓伟:《学科共识、认知美德和学者角色——化解历史知识客观性问题的新思路》,《史学史研究》2020年第1期,第64~74页;王晴佳、张旭鹏等著:《当代历史哲学和史学理论:人物、派别和焦点》,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17~330页。此外,保罗关于海登·怀特的两篇文章也已被翻译为中文发表,它们分别是赫尔曼·保罗著,张作成译:《海登·怀特的七种姿态肖像》,《世界历史评论》2020年第7卷第3期,第24~46页;赫尔曼·保罗著,杨晶晶译:《松散的网络:海登·怀特之后的历史哲学》,陈恒,王刘纯编,《新史学》第26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21年版,第78~96页。

访谈人况明祺(1995—)于2024年6月在北京师范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他在2022年2月至2023年2月之间获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资助前往莱顿大学,加入上述由保罗正在主持的研究项目。本访谈于2023年9月至12月期间通过邮件和视频对话完成,其时访谈人为在站博士后。

一 通向思考“与过去的关系”之路

况明祺:赫尔曼·保罗教授:您好! 作为一位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领域中的知名学者,请问促使您选择进入史学理论领域的契机何在?

保罗:我的学生也反复问过我这一问题。他们经常会问我:“明明有许多比史学理论更令人兴奋的主题可以研究,是什么让您对史学理论产生了兴趣?”我告诉他们,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是因为脑海中有了一些问题才开始从事历史研究的,尽管历史学家在他们18岁的时候不一定能够知道这些问题是什么,更不一定能够知道如何回答这些问题。就我个人而言,我当时的的问题是,在某种程度上直到现在仍是,关于历史遗产的:我们怎样对待来自过去的声音,如何看待让我们回忆起不同时代的纪念碑,如何处理那些挑战着我们当下的思维方式的文本?

我之所以在青少年时期就开始思考这类问题,无疑是因为我与通常的高中生不同。我在高中时期就不太喜欢学校的生活,而把大量时间花在了古典音乐上,比如弹奏管风琴和参加唱诗班等。因此,我的高中生活是在练习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Johann Sebastian Bach)的曲目,在教会仪式上弹奏管风琴,访问当地档案馆以了解更多有关我练习的乐器知识中度过的,而不是在学习法语变位词和踢足球中度过的。我最早的文章是关于管风琴的,而不是史学理论! 但也许它们二者相去不远。当然,对管风琴和德国巴洛克音乐的兴趣在高中生中并不常见,至少在我的同学们中是这样的。虽然巴赫是享有崇高地位的管风琴演奏家,但我的同学们却根本不在乎。虽然我对有着几百年历史的古老乐器很感兴趣,着迷于触摸大师们过去曾演奏过的键盘的感觉,但对我的同龄人而言,过去似乎并没有什么用。我对历史的兴趣就萌生于此,它后来被我称为“与过去的关系”。人们如何记住或选择遗忘过去? 为什么人们需要在意或忽视过去? 以及,或许是最令人好奇的,为什么人们与过去之间的联系经常各不相同^①?

当然,我们能够从社会学或人类学的视角讨论这些问题。但我决定在格罗宁根大学,而不是莱顿大学,通过学习历史和哲学去解决它们。碰巧的是,我当时并不知道弗兰克·安克斯密特(Franke Ankersmit)正在格罗宁根大学担任历史哲学讲席教授。丝毫不夸张地说,他的课程给我带来了震撼性的影响。我至今都清楚地记得他在格罗宁根学院大楼里给我们作的三年级课程演讲,当时的大多数学生似乎都不太能够理解他的演讲内容。我不敢保证我完全听懂了他的演讲,但至少可以说,我被安克斯密特的博学和他在演讲中展示领域所吸引。有人或许会说,安克斯密特的演讲留给我的就是历史——我跟着安克斯密特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后来又在他指导下顺利获得了博士学位。我的博士论文在经过大量修改之后成为了我的第一本著作——她是关于海登·怀特的。

况明祺:众所周知,海登·怀特的历史哲学向来称赞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您是从什么问题切入怀特研究的? 您对他的观点持怎样的立场? 以及,研究怀特的这段经历带给您什么样的启发?

保罗:我和其他人一样对怀特的相对主义感到困惑。怀特所说的“选择某种有关历史的看法而不是另一种,最终的根据是美学的或道德的,而非认识论的”^②是什么意思? 此外更让我印象深刻的是怀特的形象,或者说是他在史学理论领域中的声誉。一方面,学界中有许多怀特的信徒,他们称赞怀特的所有思想;另一方面,学界中更多的是直言不讳的批评者,其间少有秉持居中立立场的评论人。无论是批评还是称赞怀特的人似乎都一致认为,怀特是一名破坏者——他总是试图摧毁真实、客观性以及历史和小说之间的界线。尽管某些人冠之以“解放”,但更多的人表示了担忧,有的甚至在表述怀特

^① 赫尔曼·保罗:“与过去的关系:史学理论家们的一个议题”(Herman Paul,“Relations to the Past: A Research Agenda for Historical Theorists”),《重思历史》(Rethinking History)第19卷第3期(2015年9月),第450~458页。

^② 海登·怀特著,陈新译:《元史学:19世纪欧洲的历史想象》,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年版,第4页。

的令人沮丧的骇人思想时变得情绪激动或充满嘲讽。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情况可能发生了些许变化,但在那时——每个人都在谈论“后现代主义”的时代——怀特似乎成为一个划分人群的标识符:你要么是他的支持者,要么是他的反对者。

然而这些支持或反对评价的依据是什么?当我还是本科生的时候,我参加过一次讲座,主讲人花费了整整一个小时猛烈抨击怀特,但他的抨击建立在薄弱的证据上:他似乎并没有读过怀特的许多著述,或者说至少没有认真地读过。这完全违背了我的直觉——历史学家,或者说任何学者和科学家的第一职责就是理解。如果学术研究的实践者没有尽可能严肃地理解他们研究的对象,即使他们不赞同该对象或认为该对象冒犯了自己,那么,其学术研究也将一文不值。因此,我博士论文的中心问题是:怀特的相对主义源于何处?是什么启发了他?他想实现什么?

我发现怀特的历史思考中有一重要理念,我愿称之为“存在主义式的人文主义(existentialist humanism)”。存在主义思想的启发或许在诸如《历史的重负》等怀特的早期文章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怀特在《历史的重负》中有一纲领性的声明:“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一个能够把不连续性教育给我们的历史,因为不连续性、断裂以及混乱是我们的天性。”^①怀特想说的是“我们”,无论是历史学家还是非历史学家,都不应该在阅读和撰写史书时期望从过去本身中找到意义或指导。只要过去有任何意义,我们便将意义投射到过去身上。是我们选择如何记住,如何遗忘,如何把自己嵌入进步或衰落的叙事之中。从20世纪60年代的早期文章到他的最后一本书《实践的过去》,怀特都坚称人们有自由创造一个与自己观点和需要相符的过去,特别是当权力机构寻求以“学术研究”和“客观真相”的名义否定人们的这一权力时。怀特自始至终表达出的信息是:不要相信历史学家和政治家,运用你自己的思维,勇敢地承担自己人生的责任,并接受除了你自己给予的意义之外过去毫无意义的观念!我尝试指出,这种蕴含人类自我决定论的准存在主义式迷恋有助于解释怀特与专业历史学家之间的长期争吵和他的一些特别立场,例如,他对叙事终局的怀疑和他对大卫·卡尔的叙事实在论的拒斥。

但我本人并不赞同怀特的这种观点。我对自己和社会的理解是由我青年时代所沉迷的音乐塑造的:巴赫的《马特乌斯受难曲》、乔治·弗里德里希·亨德尔的《弥赛亚》、海因里希·舒茨的《音乐葬礼》(写于蹂躏欧洲的三十年战争期间)。即使你不是一名路德宗的虔诚信徒,你同样可以感受到这些音乐所能激发出的一些直觉:人类生命的公平,社会组织的脆弱以及当且仅当人们在意他人、不会一味追求自己的目标时,幸福生活才得以可能的信念。因此,当我写到怀特的历史哲学迫使读者思考他们在多大程度上认同作者对人类主体性的唯意志论方法、作者的反权威主义和反传统主义时,我的答案十分明确。我曾经花费数年时间去理解怀特,但我现在已经抓住了驱使他提出理论的承诺(commitments)。我想说:“不,谢谢,我不是一个存在主义者。”^②

我想我在此的评论有些刺耳。关于启发——使一本书或一个观念与我们发生共鸣的是什么?——的一个有趣之处在于,它并不要求我们完全接受或拒绝某个作者的作品。我们所有人都在选择性地接受我们接触到的作品。而且,认为花费数年时间研究某人的作品不会给自己的思想留下印记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怀特带给我的就是对历史叙事的长久兴趣。不仅如此,每当我试图理解历史叙事时,无论是现代化和世俗化的叙事,还是关于人文学史的辉格叙事,我都感到自己受惠于怀特在《元史学》中提出的多层叙事模式。尽管这并不意味着我在运用“四行四列(quadruple tetrad)”的故事形式原型,但我的确在借鉴怀特以理清论证、情节化、意识形态的模式,文本的目标受众,该文本与现有文献的关联。

况明祺:海登·怀特启发了您对历史叙事的兴趣。除了怀特,还有哪些学者在您学术成长的道路上给了您思想上的启发?您是否将一些史家视作榜样?

保罗:我不确定能否将启发我的源泉说清楚。但我认为,我在《史学理论中的关键问题》中提出的

^① 海登·怀特:“历史的重负”(Hayden White, “The Burden of History”),《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5卷第2期(1966年),第134页。

^② 赫尔曼·保罗:《海登·怀特:历史的想象》(Herman Paul, *Hayden White: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on*),剑桥:政治出版社2011年版,第151~152页。

与过去的关系模式,清楚地体现出了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Hans-Georg Gadamer)和保罗·利科(Paul Ricoeur)等诠释学哲学家的影响。我是在哲学课上知道他们的,然后和几个朋友一起阅读了他们的著作。我们花费了一个周末阅读《作为他者的自身》(*Oneself as Another*)^①,从中午到凌晨的三天——这就是我的阅读时光!当然,阅读利科的著作和阅读怀特的著作给人的体验非常不同。我很能理解为什么同事们会告诉我,他们发现利科的散文对他们而言过于深入和细致,因而不符合他们的口味。但对我而言,《真理和方法》(*Truth and Method*)和《时间与叙事》(*Time and Narrative*)都是生成性的文本,因为它们都坚称读者可以被过去或被他们认为的过去所塑造,同时过去也可以被读者的阐释选择所塑造(利科将其称为“过去与现在的相互作用”)^②。

在这些诠释学的哲学家之外,我认为启发我的东西还有很多,它们通常在历史学科之外。我想提一下文化社会学家安·斯维德勒(Ann Swidler)写的《爱的言说》。这本书写的是美国人在不同情境中以何种意义谈论“爱”^③。我欣赏它的地方是,它把对细节的密切关注与大胆的理论主张结合起来,不断地在个案和理论之间来回移动。但更为重要的是斯维德勒的“文化库(cultural repertoires)”概念——用来指代接受她采访的美国人在谈论浪漫之爱时所使用的一系列常用短语、好莱坞形象、《圣经》以及流行词。斯维德勒的“文化库”理论出乎意料地成了我当前研究项目的方法论资源。人们借助各种短语、观念和意见所组成的现有工具库来应对现状的做法,在学者恶习话语的长时段历史中得到广泛证实。

至于带给我启发的历史学家,我必须提及史蒂文·夏平(Steven Shapin)和洛琳·达斯頓(Lorraine Daston)这两位科学史家。我十分钦佩他们的学识和创见。我从他们的研究与他们对19世纪历史学家(达斯頓的研究)和学者恶习历史(夏平长期关注的一个主题)的论述中学到许多。同时,认知美德(epistemic virtues)和科学角色(scientific personae)——我研究中的重要概念——都是达斯頓此前完成过开创性工作的主题。尽管我欣赏这些同行们的研究工作,但尚不至于把他们视作榜样以形塑我自己。

二 “史学史与历史哲学”宣言

况明祺:的确,您不是诠释学哲学家、文化社会学家或科学史家,而是一位历史哲学家。然而,历史哲学经常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历史学家们认为哲学家的理论与历史实证研究之间存在距离。在新近出版的一本关于历史哲学之未来的文集中,您发出了历史学家和哲学家应当相互合作的呼吁,并提出了一项“史学史与历史哲学(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History, HPH)”宣言^④。这一宣言听上去是为历史哲学所面临的尴尬境地而发的,是吗?您希望它如何发挥作用?

保罗:HPH是我为在塔林举办的一个研讨会所写的文章中提出的,意在指明我认为的历史哲学的发展方向。我在文中说的是,在我看来,历史哲学可以更彻底地扎根在历史学家们追求的那种实证研究中,从而获得严谨性以及与其的相关性。我尝试用一张桌子的意象来阐明这点: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一道围坐在桌子旁,相互交换例证,讨论概念工具,并回应彼此的研究。这篇文章的确是在呼吁合作,其中的“史学史与历史哲学”大致上模仿了“科学史与科学哲学(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HPS)”,尽管我完全知道后者目前正面临困难。

① 保罗·利科著,凯瑟琳·布莱梅译:《作为他者的自身》(Paul Ricoeur, *Oneself as Another*, translated by Kathleen Blamey),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② 参见汉斯·格奥尔格·伽达默尔著,乔尔·温斯海默、唐纳德·马歇尔译:《真理与方法》第2版修订本(Hans-Georg Gadamer, *Truth and Method*, 2nd rev. ed., translated by Joel Weinsheimer and Donald G. Marshall),纽约:连续出版集团1989年版;保罗·利科著,凯瑟琳·麦克劳克林、大卫·佩劳尔译:《时间与叙事》3卷本(*Time and Narrative*, 3 vols.),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4—1988年版。

③ 安·斯维德勒:《爱的言说:文化为何重要》(Ann Swidler, *Talk of Love: How Culture Matters*),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④ 赫尔曼·保罗:“历史学与历史哲学:一个合作的呼吁”[Herman Paul,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History (HPH): A Call for Cooperation”],朱尼-马蒂·库卡宁编:《历史哲学:21世纪的前景》(Jouni-Matti Kuukkanen, ed., *Philosophy of History: Twenty-First-Century Perspectives*),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2021年版,第165~179页。

我必须补充一点,这种宣言式的说法有点含糊不清。一方面,宣言总是会吸引人们的注意力。如果您想吸引读者,请写一份宣言!另一方面,任何熟悉史学理论研究现状的人都不会幻想 HPH 能够成为一张真正的桌子,使学者们进行跨学科合作。史学理论是一个非常多元的领域,其中有多少学者,就几乎有多少种理论。这表明,HPH 的呼吁不应被误认为是一个会有实际有形成果的项目提案,或一个我用来联合同行的旗帜。相反,它描述的是一种立场或态度。在我看来,这对历史学家和历史哲学家都有好处。它是一种永无止境的探究态度,一个致力于理解事物所有形式和变化的承诺(我们之前谈到过这一点),一种可以使人对他人研究产生真正兴趣的谦虚感,以及适当的反还原论立场:每一视角都是局部的视角,同时揭示和掩盖着事物的某些部分。简而言之,这是在说历史学家或许能从哲学家精心提炼的概念工具中获益。这同时意味着历史哲学家或许会更密切地关注历史实践,哪怕只是为了避免脱离事实的理论化危险。

我还要补充的是,HPH 并不仅限于专业的史学研究。以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çois Hartog)备受关注的著作——《历史性的体制》(*Regimes of Historicity*)为例,该著作的某些部分读起来也像一份宣言。但我发现值得注意的是,阿赫托戈为他的主要论点——我们生活在一个当下主义(presentism)的时代——提供的证据相当少。他关于夏多布里昂的章节建立在坚实的历史学基础上,丰富的脚注展现出了这点。他对当下主义状况的分析却主要依赖轶事性的证据,例如,人们在1989年后对柏林的个人印象,已经等得不耐烦的消费者以及试图在相对稳定、可复制的照片中捕捉瞬间体验的游客等。有人不禁会问:难道没有一个被称为时间人类学的严肃研究领域,以非常微妙地方式研究不同人在不同情境下如何体验时间的吗?另外,审视当下主义的历史难道没有意义吗?我去年给一年级学生布置的文本作业是艾尔莎·赫尔曼(Elsa Herrmann)在1929年写的《这就是新女性》。该文传递出一种与阿赫托戈的当下主义相似的思想:“昨天的女性着眼于未来,更久之前的女性一心专注于过去……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今天的女性只面向当下。”^①赫尔曼和阿赫托戈指的是同一种现象吗?“当下主义”是一个当人们感到过去与快速变化的现在失去了相关性时而唤起的说法吗?或者说,我们的“时间在地化主义(temporal provincialism)”与赫尔曼所说有什么本质区别?如果阿赫托戈接受我的邀请并坐到 HPH 的桌边,我想向他询问这些问题^②。

况明祺:您的 HPH 宣言强调了历史实证研究对于历史哲学的重要性。就您个人而言,您早期曾提出了基于史家美德的“学者角色(scholarly personae)”理论,随后又从事了许多关于史家美德和恶习的历史实证研究。我们可以认为 HPH 不仅是一项关于合作的呼吁,还是一份关于您个人学术研究的路线指南吗?

保罗:首先,我认为关于美德与恶习的研究是在为人文学史(the history of the humanities)、科学史(the history of science)和职业伦理史(the history of academic ethics)领域作贡献。与 HPH 不同,它们是建立在《人文学史》《科学史》及《科学与工程伦理》等刊物之上的已经成型的研究领域,而我尝试加入它们目前正在进行的讨论。但你说得也非常正确,HPH 并不遥远,因为对美德与恶习的研究非常适合把哲学思考和历史研究结合起来。在21世纪第1个10年,我曾在《历史与理论》上发表了两篇纲领性文章,宣告了我对美德与恶习的研究路线。两篇文章都利用历史实例而提出了关于史家美德的理论观点^③。自那以后,我主要从事的是具体的历史研究,以至于几乎忘记了我作为史学理论家的一面。但我现在发现我回到了开始的地方,我将要用一些更加系统性的思考——对我过去10年历史研究成果的理论反思——来结束我目前的研究路线。

① 艾尔莎·赫尔曼:“这就是新女性(1929)”(Elsa Herrmann,“This Is the New Woman 1929”),安东·凯斯、马丁·杰伊、爱德华·迪门伯格编:《魏玛共和国资料手册》(Anton Kaes, Martin Jay, and Edward Dimendberg, eds., *The Weimar Republic Sourcebook*),伯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07页。

② 参见赫尔曼·保罗:“什么是当下主义?21世纪的历史文化”(Herman Paul,“Wat is Presentisme? Over Historische Cultuur in de 21e Eeuw”),《历史杂志》(*Tijdschrift voor Geschiedenis*)第134卷第1期(2021年6月),第109~117页。

③ 赫尔曼·保罗:“表演历史:历史学是如何被认知美德塑造的”(Herman Paul,“Performing History: How Historical Scholarship Is Shaped by Epistemic Virtues”),《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50卷第1期(2011年2月),第1~19页;赫尔曼·保罗:“学者角色是什么?关于美德、技能、渴求的十个命题”(Herman Paul,“What Is a Scholarly Persona? Ten Theses on Virtues, Skills, and Desires”),《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53卷第3期(2014年10月),第348~371页。

作为结束我个人研究路线的初步尝试,我最近作了几场关于“美德复兴”或“美德伦理回归”宣言的讲座,这些宣言源于道德哲学家伊丽莎白·安斯科姆(Elizabeth Anscombe)、菲利普·福特(Philippa Foot)和阿拉斯代尔·麦金太尔(Alasdair MacIntyre)的研究。我试图表明,这种回归宣言中隐含的三阶段叙事——过去数个世纪的繁荣、现代时期的消失、20世纪最后数十年的复兴——在历史上是不可靠的。美德的历史比这种三阶段方案要复杂和有趣得多,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也许更加雄心勃勃的是我正在为《历史与理论》撰写的另一篇文章,它暂名为“历史学家的美德伦理:前景与局限”。我的问题是,历史学家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不断提及和书写美德,并围绕美德发生争论,美德伦理学家可以从这一历史中汲取什么教训(如果有的话)。当然,“从过去吸取教训”是一个充满困难的研究主题。但就此忽略历史学家使用美德话语的经验是不明智的,因为并不是所有的经验都是好的(想想变成令人讨厌的人身攻击的争吵,或诸如女性这样被通常认为没有能力发展美德的某个群体的缺席)。这就是我提出要根据历史经验谨慎行事的原因。美德或许能够帮助我们阐明研究和教学对我们提出的个人要求。然而,一旦我们用美德语言评价他人,有时过于个人化的语言所固有的风险便不容忽视。

因此,回到你的问题,我认为我的事业非常富含 HPH 的精神。这主要是因为它试图通过哲学反思来丰富历史研究。同样地,通过历史研究来丰富哲学反思。

三 美德和恶习话语的历史

况明祺:2019年以来,您领导的项目小组开展了一项名为“学者恶习:一个长时段的历史”的研究课题。这一课题旨在探究学者们在过去对恶习的描述和评价。有趣的地方在于您选择关注恶习而非美德,同时引入了长时段的视角。为什么您选择关注恶习而非美德?与此同时,长时段的视角带来了哪些新的洞见?

保罗:你还记得洛琳·达斯顿关于客观性的研究成果吗?“客观性在根本上是一个缺乏性概念,它是由它不是什么,由和它对立的主观性所定义的,就像印象(impress)是由印章(seal)定义的一样。”^①同样的,恶习通常是由作为它们反面的美德所定义的。只要想一想“不准确(inaccurate)”“不精确(imprecise)”“不可靠(unreliable)”等单词前的负性前缀,就可以发现美德和恶习不能分开考虑。因此,我们在课题名称中使用“恶习”还是“美德”,两者区别不大。在实践中,我们既关注学者的美德,也关注学者的恶习。不过我好奇的是,恶习话语(教条主义、偏见)从长远上来看是否比美德话语(客观性、思想开放)更加稳定——该想法基于这样一种假设:相比起在哪些是理想规范的方面达成一致,学者们更易在哪些是不良行为的方面达成共识。目前的研究表明,这一假设存在问题,因为就人们对恶习话语(例如教条主义)的长期使用而言,它的重要之处在于人们如何在不同情境中创造性地借鉴改造此前描述恶习的术语,而不在于一种可以用年或世纪来衡量的线性连续性^②。

我认为更有趣的是,长时段的视角能使我们挑战西方历史思维中的现代和早期现代(early modern)的分界。直到今天,这一分界使得从事现代研究的历史学家和从事早期现代研究的同行们相互独立。它带来的麻烦是,关注现代时期的历史学家往往很难意识到早期现代的历史遗产在很大程度上继续塑造着现代学者的思维。美德与恶习话语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不仅美德话语及其含义继承自过去,就连最好用美德语言来衡量学者的才能和成就这一想法也继承自前人。在时间之上的第三个连续性就是,美德和恶习话语经常成为用来讨论什么是学者的适当任务。学者们对新的美德的不断推崇——19世纪时期的客观性,20世纪时期的思想开放——和对容易陷于恶习的持续担忧也都是因害怕学者职业受到威胁、误解、挑战而引起的。

① 洛琳·达斯顿:“文字内外的科学客观性”(Lorraine Daston, “Scientific Objectivity with and without Words”),彼得·贝克尔、威廉·克拉克编:《知识的小工具:关于学术与官僚实践的历史论文集》(Peter Becker and William Clark, eds., *Little Tools of Knowledge: Historical Essays on Academic and Bureaucratic Practices*),安娜堡:密歇根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59页。

② 赫尔曼·保罗、亚历山大·斯托格:《教条主义:一项学术恶习的历史》(Herman Paul and Alexander Stoeger, *Dogmatism: On the History of a Scholarly Vice*),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2024年版。

况明祺:看来学者们使用的美德和恶习话语有着一种特殊的历史连续性。您最近出版的《历史学家的美德》一书同样揭示出了这种历史连续性。您在书中追溯了从古代到 21 世纪的史家美德的长期历史。您通过研究世界上不同地区的史学史案例指出,历史学家的目标通常表征为一系列的美德,这反过来给历史学家的品格提出了某些要求。您因此认为:“历史研究需要的不仅仅是方法、技能以及能力;它也需要历史上那些被视作美德的品性特征。”^①这一论断是否让我们对历史学家的身份有了新的认识?

保罗:这一发现过去已有,它并不是新的。然而,就史学遗产以及我们如何与过去相联系的问题而言,我一直以来的兴趣是探究美德在今天能告诉我们什么。美德如何能够帮助我们理解历史学目前面临的困境?我刚才已经说过,美德话语有可能会被滥用,尤其是将它用于评价他人时。但如果我们将自己作为分析的对象,思考哪些美德和恶习已经成为我们的后天本性,它将可能成为一个自我审视的有力工具。例如在欧洲,教授们出于获得外部资金的期望而不断设计新的研究项目,从而导致学术研究的某种“项目化”——这既有好处也有坏处。它同时还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研究人员的角色特征,因为它要求研究人员具有某些特定的性格特征以成为成功的“资助猎手(grant hunter)”。性格外向的人通常比内向的人更加容易地把自己的研究想法推销给项目的评选委员。要有一定的勇气——我不确定这是美德还是恶习——才能说:“这就是这个领域需要的东西,如果你给我 150 万欧元,我就可以提供它。”但我注意到,包括我在内的大多数学者都倾向于轻蔑地谈论这种创业型研究人员。十分明显,将这种创业型研究者视为学者职业的理想模范是不可接受的。与此同时,包括我在内的所有学者都在不停地撰写新的资助申请,不断地参与到寻求资助的游戏当中。这种反差不仅带来了关于诚实和虚伪的问题,还促使我们探究是什么使寻求项目资助在具有吸引力的同时又使人厌恶。它涉及什么美德和恶习?它促使我们养成了哪些好的或不好的习惯?

况明祺:正如您所言,美德和恶习的内涵会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这意味着历史学家应当历史化地理解那些被标榜的美德和被拒斥的恶习。那么,当历史学家采用这种历史化视角去看待诸如“客观”“独断”等美德和恶习时能够获得什么?

保罗:众所周知,我们以过去为镜认识自己,不是因为我们和过去相似,而是因为我们和过去不同。直面与过去的差异是认识现在的独特特征的有效方式。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历史化的方法有助于对现今的美德和恶习话语进行批判性的反思。如果你愿意的话,它可以帮助我们当前的情况历史化。就当前的讨论而言,我们之前谈到的美德和学者任务之间的关系就或许是一个体现出历史化视角的相关案例。人们轻易地指责资助申请者的机会主义行为,用 17 世纪的话来说,将其指责为充满“野心”和“贪婪”的行为^②。然而也许更为有趣的是这样一种次生问题:这些评判揭示出了哪些与我们学术工作相关的任务?对研究资助无止境的追求可能会损害什么?我们认为重要的事情和我们真正关心的事情之间是否存在不同?

况明祺:您的研究表明,历史学家的美德和恶习对于理解历史学家的职业身份和反思历史实践都至关重要。但人们在谈论历史学家和历史学实践时通常还会提及历史学家的天赋、才能、学识以及历史学的方法等不同方面。在您眼中,美德与天赋、才能、学识、方法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您是否认为美德是第一位的?

保罗:美德没有成为最基础的必要。我认为美德是我们所需要的,但并非是最重要的。也许将美德视作连通历史学家的天赋和历史学家任务之间的媒介会更好。一方面,历史学家有一系列的任务要做:阅读书籍、访查档案、撰写期刊文章、进行同行评议;另一方面,历史学家本身是由一群具有不同背景、兴趣、品质的个体所组成的多元群体。美德介于两者之间:它们指出了历史学家的任务所需要的个人态度、气质、习惯或性格特征。例如,档案研究要求某种程度的细心(carefulness)和精确(precision):如果你记录笔记马虎,那么你不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研究人员。同样地,评论文章或书籍要求评论者是诚实(honesty)且公平(fairmindedness)的。没有这些美德,整个同行评议机制将变成一场闹剧。这种研究任务和个人美德之间的关系解释了为什么从历史上看,历史学家不仅使用美德和

① 赫尔曼·保罗:《历史学家的美德》,第 54 页。

② 相关研究可以参见萨里·基维斯托:《学问的恶习:早期现代大学中的道德与知识》(Sari Kivistö, *The Vices of Learning: Morality and Knowledge at Early Modern Universities*),伦敦:博睿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76~146 页。

恶习话语来评估他人的成就,而且用它们来讨论历史学家这一职业。对史家而言,爱国是不是一种美德?偏袒穷苦之人是不是一种恶习?只要不同的研究任务能够转化为不同的美德要求,那么,不足为奇的便是,关于历史学家应有的美德的争论往往会变成关于史家任务的争论。

或许接下来说的会让人听起来感到沮丧,但我想再就美德并非其他方面之基础的看法补充一点。使我感到难以理解的是,为什么人们总是在询问我,美德是不是历史学家事业的基础——例如历史学的方法可否简化为美德——如果不能,为什么我要关注美德。在我看来,这类问题中隐含的非此即彼思维是基础主义思想(foundationalist thinking)的产物。我无意将历史研究的丰富内涵简化为单一的抽象原则。与之相反,我试图引起人们对历史研究中未被重视的维度的关注。我准备将美德称为历史学家的研究任务和他们的才能等方面之间缺失的一环^①。但美德并不是所有重要事物的本源(*fons et origo*)。

况明祺:听上去您秉持着一种反基础主义的多元论立场,无意在历史学中寻求一种物理学式的统一场论。这使我想到了尼古拉斯·德克斯(Nicholas Dirks)教授的评论。他认为您提出的“学者角色”理论能回答的史学史问题不够多。他说:“我并不清楚,是否可以认为保罗引入的角色概念……在实际上足以回答我们可能会关注的史学史问题,关于如何确立史学潮流,如何确定史学的历史轨迹,如何塑造史家的职业生涯,如何保障史学的专业道路以及如何断言学术的区别、争论、话语等问题。”^②您是否会用多元论立场来回应德克斯教授?

保罗:是的,德克斯教授的评论就像是上一个问题的另一种说法。我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有点犹豫,因为我必须承认这篇评论是我收到过的最为引人注目的评论之一。德克斯教授的基本观点是,“学者角色”不足以解释历史研究的每一方面。他陈述了显而易见的事实。我希望没有人会声称某个单一概念能够捕捉历史研究的全部方面。更不必说,我们还需要考虑制度、方法论争论、政治动荡等许多学术研究之外的问题。历史学家们几十年来一直在考虑这些,并且仍将继续研究下去。然而除此之外,我们需要一个术语来描述美德习惯化的微妙过程,美德的具象和人格化。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我一直致力于研究“精神(ethos)”“习惯(habitus)”“立场(stance)”以及“角色(persona)”等术语,试图理清它们各自的优缺点。就此而言,德克斯教授评论的《如何成为一名历史学家》一书是探索我所理解的角色概念在不同学科背景下的适用性的几项重要成果之一^③。该书旨在扩展历史学家的工具箱,而不是将我们的锤子、螺丝刀和钳子换成一把锯子。我们通过增加复杂性层次和扩充概念工具箱把我们不足以看清事物的双眼变得锐利的方式来改善我们的历史感。我们不要假想有一把可以解锁一切的万能钥匙!

四 人文学史与当代史学理论潮流

况明祺:现在让我们把目光从您的学术研究转向当代史学理论潮流。在开始谈论之前,我想请问,为什么您在莱顿大学担任的是人文学史讲席而非史学理论讲席或历史哲学讲席?考虑到您的学术事业和荷兰长期以来重视历史哲学的传统,后者似乎更加合适。

保罗:为什么我担任的是人文学史讲席?这自然有制度上的原因。我想我的大学并不太需要设立一个史学理论的讲席职位。在当前以STEM(科学、技术、工程、医学)学科占据主导地位的学术环境中,大学需要的是能够解释什么是人文学科,人文学科为什么重要的教授。此外,从人文学科历史的角度历史性地处理这些问题似乎是有益的。长期以来,我们试图用简单的程式捕捉“人文学科的理

① 赫尔曼·保罗:“史学史中的缺失一环:在阿尔弗雷德·多夫的世界中的学者角色”(Herman Paul,“A Missing Link in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Scholarly Personae in the World of Alfred Dove”),《欧洲思想史》(*History of European Ideas*)第45卷第7期(2019年6月),第1011~1028页。

② 尼古拉斯·德克斯:“所以你想成为一个历史学家么?”(Nicholas Dirks,“So You Want to Be a Historian”),《历史与理论》(*History and Theory*)第61卷第3期(2022年8月),第478页。

③ 参见赫尔曼·保罗编辑的《如何成为一名历史学家:历史研究中的学者角色,1800—2000》(Herman Paul ed.,*How to Be a Historian: Scholarly Personae in Historical Studies, 1800—2000*),曼彻斯特:曼彻斯特大学出版社2019年版;克里斯丁·恩伯茨、赫尔曼·保罗主编:《东方学史上的学者角色,1870—1930》(Christiaan Engberts and Herman Paul, eds.,*Scholarly Personae in the History of Orientalism, 1870—1930*),莱顿:博睿出版社2019年版。

念”，而其中的大多数都因过于静态，过于依赖历史的偶然集合，或过于有限的涵盖范围而被证明是不足为恃的。把人文学科视为各个国家在不同形式的路径中演变出的历史产物，似乎是一个较好的处理方式^①。

人文学史吸引我的原因还有两个。一个是我感兴趣的问题并不只局限在历史学科之中。你提到了我为“剑桥元素(Cambridge Elements)”^②丛书撰写的《历史学家的美德》一书。那么写一本关于语言学家的美德或艺术史家期望彼此展现出的美德的书同样是可行的。甚至更好的是，进行一种跨学科比较的美德研究。美德和恶习话语过去怎样在学科间传播？为什么历史学家会比物理学家和化学家更加频繁地谈论美德？我目前正在编辑一本暂名为“19世纪时期人文学科中的美德和恶习”的论文集。它的目标是追溯不同人文学科中的美德和恶习话语，希望从中发现相似和差异，并探究诸如历史学、文字学、哲学、语言学、艺术史、教会史、圣经学等学科之间的联系。正如《人文学史》的编辑任博德(Rens Bod)和他同事们喜欢说的那样，人文学史是一项比较的事业^③。我对此非常赞同。

此外，当涉及历史遗产和过去-现在间关系时，历史学通常会偏爱诠释学家们的一些观点。历史学家们特别擅长历史化、情境化，探究文本、形象、观念在过去的含义。然而在其他人文领域占据中心位置的是另一些问题：关于评判的问题(休谟的实然与应然的二分法有多大的说服力)，或关于知识挪用的问题[我们能从莎士比亚《冬天的故事》(*The Winter's Tale*)中学到什么关于热情好客的知识——这是目前欧洲政治生活中的紧迫主题]^④。把整个人文学科纳入研究的好处之一在于，它能让人把历史学看作是一个整体的部分。一方面，这意味着历史学家们能够集中关注情境化，因为他们有其他人文领域的同行来负责处理其他方面的阐释工作；另一方面，它表明历史学家们只需稍稍拓宽一下他们的视野，就可以认识到他们对“当下主义”和“道德主义”的厌恶是特定学科的发展产物——令大多数哲学或文学研究的同行感到费解。这种洞察力也许可以帮助历史学家克服一些在处理与当下相联系的历史主题时所面临的焦虑。

况明祺：在史学理论和史学史领域中深耕 20 余年之后，您感受到的史学理论目前最为突出的发展潮流是什么？

保罗：一个清晰的发展趋势就是重视史学理论的地区发生了转移，拉丁美洲正在成为史学理论研究最为繁荣的大陆。你知道若奥·奥哈拉(João Ohara)提供给“剑桥元素”丛书的《历史理论与历史哲学》一书么？他对巴西、墨西哥和阿根廷学者们近来研究工作的调查会让那些仍然相信柏林、巴黎或芝加哥是世界中心的人感到惭愧。奥哈拉就“中心”这一形象——一个当然背负着殖民历史的隐喻——提到了两件有趣的事情。第一，他注意到拉丁美洲的史学理论家花费了巨大努力去追随欧洲和北美地区的历史哲学，特别是诸如怀特、米歇尔·德·塞尔托(Michel de Certeau)和约恩·吕森(Jörn Rüsen)等学者的研究。也许正因如此，《元史学》出版 50 周年纪念会并没有在卫斯理大学(Wesleyan University)或加州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Santa Cruz)举办，而是在维罗尼卡·托齐(Verónica Tozzi)、亚历杭德罗·阿劳霍(Alejandro Araujo)、玛丽亚·伊雷斯·拉格雷卡(Maria Inés La Greca)等人的努力下于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Universidad Nacional Autónoma de México)举办的。奥哈拉想知道：这些致力于理解、翻译和挪用西方经典的所有努力在多大程度上暴露出某种自卑感，或者说至少是一种处于知识世界边缘的感觉？他观察到，“西方学者

① 赫尔曼·保罗：“人文学科的谱系：一个领域的愿景”(Herman Paul, "Genealogies of the Humanities: A Vision for the Field"),《人文学史》(*History of Humanities*)第 8 卷第 2 期(2023 年秋季),第 199~207 页;赫尔曼·保罗编:《书写人文学史:问题、主题、方法》(Herman Paul, ed., *Writing the History of the Humanities: Questions, Themes, and Approaches*),伦敦:布卢姆斯伯里出版社 2023 年版。

② “剑桥元素”是剑桥大学出版社新推出的系列丛书，旨在探索新的学术出版方式。该系列的主要特征有二，一是每本书的篇幅较短，长于单篇论文但又比通常的学术著作短上许多；二是在出版形式上采用了数字出版的形式。

③ 任博德等：“一个新的领域：人文学史”(Rens Bod, et al., "A New Field: History of Humanities"),《人文学史》(*History of Humanities*)第 1 卷第 1 期(2016 年春季),第 5 页。

④ 以着眼于当前移民问题的方式阅读《冬天的故事》的成果可以参见朱莉娅·莱因哈德·拉普顿的《与莎士比亚一起思考：政治与生活论集》(Julia Reinhard Lupton, *Thinking with Shakespeare: Essays on Politics and Life*),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 2011 年版。

仍然受到优待,他们的思想似乎在某种程度上比非西方学者的具有更好的普适性”——这当然不符合真实^①。事实上,奥哈拉提到的第二点就是,怀特、塞尔托或吕森的思想与埃德蒙多·奥戈尔曼(Edmundo O. Gorman)或恩里克·弗洛雷斯卡诺(Enrique Florescano)的思想一样,是受到语境限制的。难道我们不都是站在自己的主体立场上说话的吗?尽管如此,我们不还是能够参加超越了自身文化视野的对话么?如果这就是新一代拉丁美洲史学理论家带给史学理论领域的新气魄,那么在不远的将来,欧洲的史学理论家将会给他们的学生布置巴西和墨西哥同行们的文本作业,从而发生和现在相反的情形。你认为中国是否正在发生相似的情况?

况明祺:我认为是的。史学理论目前正在引起研究中国历史学者们的关注,尤其是中国史学史领域中的史家。和拉丁美洲的同行们一样,中国学者曾经花费了大量精力去追逐西方历史哲学。时至今日,西方史学史领域中的学者们仍在不懈地引介西方历史哲学的前沿动态。但与此同时,中国学者正在思考通过复兴中国传统学术话语以构建中国史学理论(历史哲学)的可行性,并尝试付诸实践。以“叙事”为例,有学者指出,中国古代史家所说的“叙事”和西方历史哲学中的“narrative”并非是相同的概念,通过发掘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中的“叙事”理论,中国的历史学家将能够把中国历史学的传统与案例注入“叙事学(narratology)”领域中^②。或许在不远的将来,随着中国学者更多地参与到史学理论的国际讨论当中,来自中国的文本同样能成为您和其他欧洲同行们布置给欧洲学生的作业。

保罗:那真是太好了!现在回到你提出的问题,我认为还有一两个值得提及的趋势。在地理性的转移之外,或许你已经注意到了,史学理论家们讨论的主要议题发生了变化。严格而言,历史性、时间性、当下主义等理论并没有提出什么新东西;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和沃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在一个世纪前讨论的就是这些问题。但这些问题成为如今的中心议题这一现实可以告诉我们一些重要的东西。我们可能会认为存在一个可以教授给学生的经典主题范围:从解释和意图到叙事和表现。然而实际上,史学理论在不断发展,不断开辟新的道路以应对新的挑战。或许可以并不夸张、甚至有点讽刺地说,史学理论最具创造力的时期正是它陷入危机的时期——想想在20世纪早期弥漫欧洲的历史主义危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历史意义”问题以及像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痛苦经历过的那种“殖民启蒙悲剧”^③。在今天,气候变化似乎充当了游戏规则的更改者。气温和海平面上升的未来,乃至地球再也无法居住的世界末日场景,促使人们反思既有的历史叙事。更为重要的是,这迫使我们重新思考人类走向怎样的未来这一老问题。上一代人把这种问题视为“思辨的”而置之不理,同时认为它不值得批判的历史哲学家认真对待,这样的信心似乎已经消散了。从《历史与理论》中的“历史的未来(Historical Futures)”系列论文来看,未来已经带着一种紧迫感卷土重来,可能会让许多现有话题黯然失色。阿瑟·丹图(Arthur Danto)的“理想编年史家”和感觉自己正在泰坦尼克号上的历史学家之间的关联性有多大^④?

最后的问题是,人们在多大程度上会继续在“史学理论”和“历史哲学”的传统之下思考新的或已有的问题。欧洲和拉丁美洲曾把“社会学”作为反思历史变迁过程的首选学科。我在几周之前读到了佐尔坦·博迪查·西蒙(Zoltán Boldizsár Simon)接受的访谈。作为目前人类世历史理论讨论中的代表人物,西蒙却在访谈中表示“历史哲学”只包含他正在进行的部分研究^⑤。你可能会从我到目前为止所说的内容中了解到,我发现让自己成为一名人文学史家(一个并不害怕提出理论问题的人)比起

① 若奥·奥哈拉:《历史理论与历史哲学:全球性的变化》(João Ohara, *The Theory and Philosophy of History: Global Variations*),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22年版,第31页。

② 参见朱露川:《论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中的“叙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2020年第5期,第123~129页;朱露川:《“书事”新论:范畴、恒理及其他》,《史学月刊》2023年第9期,第10~14页。

③ 赫尔曼·保罗:“一切都在摇摇欲坠:为什么历史哲学繁荣在危机时代”(Herman Paul, “Everything is Tottering: Why Philosophy of History Thrives in Times of Crisis”),《低地国家历史通讯》(*Low Countries Historical Review*)第127卷第4期(2012年12月),第103~112页。这里的“殖民启蒙悲剧”出自戴维·斯科特的《现代性的征召:殖民启蒙的悲剧》(David Scott, *Conscripts of Modernity: The Tragedy of Colonial Enlightenment*),达勒姆:杜克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④ 阿瑟·丹图:《分析的历史哲学》(Arthur Danto, *Analytical Philosophy of History*),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65年版,第149~181页。

⑤ 卢卡斯·维尔堡:“寻找未来的历史”(Lukas Verburgt, “Op zoek naar een toekomstige geschiedenis”),《荷兰书评》(*The Dutch Review of Books*)第8卷第5期(2023年11月),第30页。

成为一名史学理论家要更容易。换言之,史学理论这一标签可能会改变或消失;也许更可能的是,史学理论在世界的某些地区消失但在另一些地区保持存在。

况明祺:您谈到了西方之外的世界其他地区。当下许多学者正在努力纠正前几代学者的欧洲中心或西方中心主义。在《历史学家的美德》一书中,您不仅提及了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西方国家,也提及了中国、印度以及全球南方地区。您为什么进行这样广阔的研究?作为一名西方学者,您如何研究非西方地区的史学?

保罗:你问题中的“为什么”部分很好回答。我在此想援引一位同行,他最近给了我一本他撰写的关于中国史学的书。他在扉页的题词中写道:“献给赫尔曼,希望这本书能够让人们对历史学有更广阔的视野。”^①这句话能很好地回答这个问题。扩大地理范围是开辟新视野的一个手段,就像我们前面谈到过的那种沿着时间轴扩展的长时段方式。对我而言,“如何做”是一个困难的问题,特别是当你像我一样认为历史学家应该使用第一手的,最好是用原始语言书写的材料时。对于我们这类没有精通多种语言,或十分忙于其他任务而无法学习一门新语言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要求。不仅如此,由于我们认识到在气候变化加剧的当下,继续在世界各地间到处飞行是不负责任的,这使得去遥远的图书馆搜集资料变得比以前更为困难。那么我们该怎么办?

我认为合作是破题的关键。无论是在收集和阅读原始资料的方面,还是在利用它们来解决相关史学问题的方面,我们必须比以前的人文学科学者进行更多的合作。我目前有一些很想阅读的 20 世纪 60 年代的未被电子化的苏联资料。由于我从来没有学过俄语,所以我不得不寻求援助——就是这么简单。但在理想的情况下,我想寻找的不仅仅是一名翻译。找一位具有相关知识背景的俄罗斯历史学家无疑会更加有趣。试想一下这会发生什么:来自世界各个地区的专家们通过线上视频会议平台展开一场对话,讨论我刚才提到的苏联资料如何与同时期的波兰和东德资料发生对话,或同中国在相似之事上发生关联。合作将允许跨语言的比较,而我们没有人能够单独完成这样的比较。我并未幻想能够轻易地完成与远方同行的合作,尤其是当我们之间的互动仅限于电子邮件和视频通话时。尽管如此,如果我们一边想进行不只是建立在翻译文献上的全球史书写,一边又想尽量减少碳排放,这种远程合作可能就是前进的方式。

五 寄语中国读者

况明祺:您对全球学术合作的致意值得钦佩!在访谈到达尾声之际,您能否给那些想要研究西方史学理论和史学史的中国学者一些建议?

保罗:首先,准备好语言的学习,或者说为我在处理俄语资料时遇到的那种语言困难做好准备。只消去看下那些“大人物”们——像我之前提及的利科、塞尔托以及阿赫托戈等人——就可以发现熟练阅读英语文献会是一个好的开端,因为他们的大部分成果都已经翻译成了英文。但如果你想更细致深入地了解这些法国理论家的创见,例如这些理论出现的相关背景,你就还需要学习法语。这同样适用于许多其他欧洲国家的资料。直到现在,基本上每个人都仍在使用母语写作。二手文献同样如此。考虑到几乎所有的关于德国史学的书都是用德语撰写的,我只能遗憾地说,如果你只依赖英语文献,那么你将无法全面了解德国史学当前的知识状况。这些就是全部的不利消息!

但我认为也有好消息。正是这些民族传统——法国学者用法语撰写法国史学,德国学者用德语撰写德国历史和史学理论——使得来自外界的观点非常受欢迎。无论在哪,通常都是外来学者,或相对外来的学者,通过提出不同问题、拓宽研究视野或进行新的比较而带来了创新的动力。再次以 19 世纪的德国史学为例。它往往被视为现代史学的摇篮或我们需要摆脱的沉重的史学遗产。我在前几天购买的书中看到一个典型的说法,作者沃纳·吉塞尔曼(Werner Giesselmann)认为,现代历史学

^① 保罗指的是由波兰学者戴维·洛加茨(David Rogacz)所写的《中国历史哲学》(David Rogacz, *Chinese Philosophy of History*, London: Bloomsbury, 2020)一书,该书以整体论的视角讨论了中国从古代到 20 世纪的历史哲学。

“在很大程度上必须通过与我们 19 世纪历史学家的立场之间的对比来定义”^①。注意其中的“我们”：它表明，对这位 20 世纪 90 年代的德国史家而言，德国 19 世纪历史学的历史并不是一项外国文化研究，而是一种对明显是负面的遗产的接受问题。如果让与这个主题有一定距离的学者参与进来，让他们以一种没有负担的方式提出新观点并着眼于无论是朋友还是敌人都没能看出价值的主题，这无疑对 19 世纪德国史学史研究而言是有益的。例如，现在是时候研究 19 世纪欧洲的历史学是如何被资助的了——被谁(国家、社会、个人捐赠)资助，为了什么资助以及资助的条件是什么。我们几乎完全不知道这些，因为无论是批评还是自称继承 19 世纪历史学的学者都把注意力放在了方法论和政治的方面。

换言之，若你打算研究西方历史思想，就不要试图让自己和西方思想中的权威保持一致。恰恰相反，你应该利用你外在于西方的主体地位，尝试去发现文献中的盲点，同时不要害怕提出以前没有人提过的问题。

况明祺：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聊了许多。现在请允许我最后用一个私人问题结束这次访谈。您在访谈开始时告诉我们，您在开启自己的学术生涯之前是一位喜爱管风琴的演奏者。我想问的是，您的管风琴演奏者这一历史学家之外的“身份”还在吗？

保罗：这是个好问题！是的，十分幸运，我的管风琴演奏者“身份”还在。尽管我花在演奏乐器上的时间已经没有原来多了，但我可以告诉你，对我来说，弹奏一架美丽的旧管风琴仍然是一种比发表一篇新文章更令人愉悦的体验。在莱顿的马雷教堂(Mare Church)和教会歌唱团一起演奏，或在会议的间隙溜出办公室去莱顿的高地教堂(Hooglandse Church)演奏一段巴赫——这都是让我继续前进的乐趣！

收稿日期 2024—01—19

作者况明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讲师。北京，100875。

Historians' Virtues and Vices: An Interview with Professor Herman Paul

Kuang Mingqi and Herman Paul

Abstract: This article presents an interview with Dutch professor Herman Paul, a prominent contemporary philosopher of history and historian of historiography. Having studied under the esteemed Dutch philosopher of history, Frank Ankersmit, Professor Paul has contributed significantly to the field by incorporating the virtue language into historical theory and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notably introducing the concept of “Scholarly Personae” to illuminate the complexities of historical practices. The interview traces how Herman Paul immersed himself into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theory, explores the connotation of his advocacy for “the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and the philosophy of history”, discusses his current project on the history of virtues and vices, exhibits his perspectives on the trend of present historical theory, and offers his suggestions for Chinese scholars interested in Western historical theory and history of historiography. Through this dialogue, the article offers valuable insights into Professor Paul's scholarly contributions and provides a glimpse into the forefront of contemporary research in historical theory.

Keywords: Herman Paul; Scholarly Personae; Virtues and Vices; Occupation and Identity

【责任编辑 李恒】

^① 沃纳·吉赛尔曼：“十九世纪现代史”(Werner Gisselmann, “Die neuzeitliche Geschichte im 19. Jahrhundert”), 尤尔根·米特克编：《历史学在海德堡：100 年史学研讨会，50 年弗兰肯-普法尔茨历史区域研究所》(Jürgen Miethke, ed., *Geschichte in Heidelberg: 100 Jahre Historisches Seminar, 50 Jahre Institut für Fränkisch-Pfälzische Geschichte und Landeskunde*), 柏林：史普林格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92 页。